

关于实践问题研究中的规律的辩证思考

欧阳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作者简介] 欧阳英(1964-),女,湖南武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

[内容提要] 中国传统实践观与西方近代实践观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在对它们展开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实践问题研究中的一些规律性东西得以显现:首先,在知行关系问题上达到认识的统一并非易事;其次,关于实践内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应该是什么”到“是什么”的发展过程;其三,关于知行关系的探讨是一个认识不断反馈的过程;其四,关于知行关系的认识是一个逐渐逼近真理的过程;其五,实践与价值的关系问题是关于实践问题研究中的本质性问题。

[关键词] 中国传统实践观;西方近代实践观;实践问题研究中的规律

[中图分类号] BO-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1999)06-0046-05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都对实践问题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讨。毋庸讳言,中国传统实践观与西方近代实践观(这里主要是指由德国古典哲学实践观直至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发展轨迹,但是我们可以在对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有所了解的同时,进一步寻找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共同点,总结出一些实践观发展过程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并在新的起点上认识现代实践观的新的生长点和发展前景。

从历史上看,不论是西方还是中国都认为实践问题是应该认真加以解决的重大问题,只不过在具体提法上,中国传统实践观有别于西方近代实践观而将实践活动用简单一个“行”范畴来加以概括。尽管中国传统实践观与西方近代实践观所提出的各种观点都是围绕实践问题而展开的,但是它们之间无论在考察问题的角度,还是在认识问题的深度和理解问题的背景上,都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具体来说,它们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考察实践的角度不同。中国传统的

实践观历来侧重于从知(主要体现为感性与理性的笼统不分)与行的区别中把握实践的存在,西方近代实践观则是着重从理性与实践的内在联系中把握实践的存在。在对待知与行关系的问题上,中国传统的实践观一直注重探讨知与行的区别,这是有目共睹的。由于执意搞清楚知与行的区别,如知与行孰难孰易、孰轻孰重、孰先孰后等等,因此,中国古代哲人不知不觉地陷入到无休止争论的怪圈里,整个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历程都体现了这种争论。在欧洲哲学史上,“只是到了德国古典哲学那里,实践才开始受到与它的重要性相符的评价”(卢卡奇语),因此,德国古典哲学实践观具有里程碑的性质。当亚里士多德主要从理论与实践的区别中把握实践,坚持主张理论与实践的区别是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区别时,西方实践观的发展进程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是随着康德认识到理性与实践之间存在着本质的联系之后,整个情形发生了变化。通过较客观地揭示实践的能动性,德国古典哲学实践观为通向科学的实践观铺平了道路。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实践观通过确定唯物主义原则而完成了建立科学实践观的艰巨任务。

另一个方面是,对“知”的分析程度不同。中国传统实践观对“知”的理解十分笼统,从而直接影响了对实践的本质特征的把握;德国古典哲学实践观对“知”进行了具体分析,从而在理性与实践之间建立了某种特殊的内在联系,为客观地理解实践的本质特点奠定了理论基础。“知”是由感性和理性组成的。虽然中国传统哲学史上不乏一些经验主义者如墨子等,但是长期以来,中国传统的实践观一直并没有刻意将“知”区分为感性和理性。由于理性与感性被混为一团,因此理性与实践之间的特殊联系及其意义就很难被发现。王阳明“消行以归知”的“知行合一”说的出现恰好说明了这一点,他甚至认为:“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但是通过将“知”区分为感性、知性和理性,康德却看到了理性与实践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了理性对道德实践所能起到的价值规范作用,从而使实践的能动性豁然明了。当然在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实践观中,最终也出现了“消行以归知”情况。究其原因,则主要在于康德等人并没有充分地意识到,尽管实践有受制于理性的特点,但是人的理性本身必须依靠实践证明自己的存在,因而实践是更根本的存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正是在这一点上突破了原有的错误观念,极力强调实践的根本地位,才真正带来了实践观发展史上的重大革命。

第三个方面是,考察实践问题的文化背景不同。由于近现代西方文化积极倡导实证精神,注重的是科学分析,因此,在对待实践的问题上,它较重视从客观实际出发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劳动出发解释实践,就是这种实证精神的一种真实体现。马克思找到了实践的现实表现形式——生产劳动,并最终将人类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认识推向了科学的高峰。但是与西方近现代文化传统不同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点是,注重从人本身出发去体验问题的答案。中国传统知行观将“道德践履”视为“行”的最基本形式,既是一种伦理精神的体现,也是这种体验哲学的客观表现。中国传统哲学家们用人的内在尺度而不是用客观的外界尺度去审视人的知与行,因此,他们认为,所谓认知,归根到底,就是对道德规范合理性的体认;所谓实践(行),就是道德实践,就是“存诚养性”的道德涵养。对于他们来说,只要道德主体能对知行关系有一种明晰的整体把握,能自觉地意识到道德行动的重要性,认识到体认、反省道德观念和道德意识的重要意义,并注重在现实生活中躬行践履自己的道德伦理,这已经足够了。

当然,除了具有上述区别之外,中国传统实践观与西方近代实践观之间也表现出相互联系的一面。

首先,它们都在知与行的关系中考察行。前面提到,德国古典哲学实践观的主要特点就在于能够从知与行的关系中理解行。当然应该说,中国传统的实践观在这方面的表现是异常独特的,在理论上它甚至就是直接以知行观命名的。中国传统知行观不仅关心知行谁先谁后,而且还着重分析了知行谁难谁易、谁轻谁重,从而向人们展现了知与行区别的具体画面。在这幅画面中,我们看到,由于知与行各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且互为前提与基础,因此,立足于不同的角度,知行关系在先与后、难与易、轻与重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的情形,表现出一定的相对性。其次,它们都经历了一个逐渐认识到行的重要性的过程。康德只认为道德实践是对实践理性的实现,但到马克思却明确指出,以往的“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在马克思看来,凡是人类从一定的观念出发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都是实践;任何实践都是对理论的实现,都是高于理论的。而就中国传统实践观而言,也经历了一个由否定行对知的意义到重视行的存在的过程,就是说,从最初认为“是以圣人不行为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老子)直至孙中山充分强调“行之而后知之”的过程。因此,在关于行的重要性的问题上,中西方实践观最终是殊途而同归的。

二

在对中国传统实践观与近代西方实践观展开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关于实践问题研究中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也就一目了然了。

第一,在知行关系问题上达到认识的统一并非易事。

虽然中国传统实践观一直在围绕知行有无先后、孰先孰后这一核心问题做文章,但是却一直未达到统一的思想认识。且不说王阳明与王夫之关于知行关系所提出的两种迥然有别的认识结论即“知行合一”说(王阳明)与知行“相资以为用”(王夫之),就是即使到了近代,仍存在着谭嗣同的彻底的主知主义和孙中山的行先知后原则之间的鲜明对立。而且在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实践观中,也有康德无法在技术实践的问题上将理性摆放在第一位置的困惑,和最终只有在道德实践中确立理性第一性地位的无奈。这充分说明了对知行关系进行科学认识的难度。其实,如果我们认真地追究原因,则不难发现,问题

主要出在实践本身。实践的特殊性(即与认识的不可分割性)使得人们难以在知行孰先孰后上作出明确的选择:倘若简单地认定行是知之先,则会面临无法解释行的主观能动性究竟从何而来的问题,因为行的主观能动性只有来自于知;倘若简单地认定知是行之先,则会面临无法解释知究竟从何而来的问题,因为知只有在行中获得。通过从“社会的人”出发,马克思主义最终使这一问题得到科学的解决,它使人们认识到实践(即行)是更根本的存在。

第二,关于实践内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应该是什么”到“是什么”的发展过程。

从西方哲学发展史来看,在关于实践内涵的认识上,康德率先提出了实践“应该是什么”的价值判断,从而将人们关于实践内涵的理解引向深入。康德看到了意志在实践中的作用,这是可取的。但是他却臆造了一个能获得意志自律的实践空间即道德世界,希望在道德世界中实现绝对的意志自律,就是说,绝对自由地实现完美的道德价值需求(即“善良意志”)。这样,在他那里,实践的本质在于能够实现“善良意志”,而所谓实践就是能够实现“善良意志”的活动。显然,康德的这一认识结论并不是从实践的客观实际情况出发界定实践,而是仅从“应该是什么”的角度界定实践。康德通过认识到道德价值规范在实践中的作用,从而间接地引申出关于实践的价值判断。马克斯·韦伯指出:“我们应该能理解‘价值判断’,它并不隐含也不特别说明什么别的意思,而是根据我们的感受对各种现象作出满意与不满意的实际评价。”^①根据这一逻辑原则,虽然康德关于实践的价值判断具有一定的认识论意义,但是它的局限性也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它带有主观的成分。但是,到了马克思那里,关于实践的这种价值判断逐渐被事实判断所取代。马克思从“社会的人”出发,明确将实践规定为“人的感性活动”、“人的客观活动”等,并指出生产劳动是实践的基本形式,致使人们对实践本身究竟“是什么”有了一定的了解。尽管马克思关于实践的事实判断还不够完善,尚缺乏十分清晰的明确性,但他那里,关于实践的事实判断却已有了雏形。他为人们进一步准确地把握实践内涵奠定了良好的认识基础。

中国传统知行观一直将“道德践履”视为“行”的最基本内涵。这种认识的狭隘性是显而易见的,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它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家对“行”的概括、解释较早就已达到了价值判断的水平并一直停留在此之上。由于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传统

思维模式等的限制,中国古代、近代哲学家始终没有摆脱价值判断的束缚,突破伦理学对行的狭隘规范,将对“行”的理解从价值判断中解放出来,发展成为事实判断。他们都不可能看到实践的基本涵义是指能动地变革、改造现实的活动,而是一味强调道德原则与人的行为的统一,以为道德原则不能脱离人的行为,人的行为必须体现道德原则。尽管这种思想认识对稳定社会秩序、规范人的行为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却较为严重地妨碍了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向更高、更深层次的推进。

第三,关于知行关系的探讨,是一个认识不断反馈的过程。

实践与认识各自有着自己独立的规定性,同时它们之间又有着难以分割的联系,也就是说,实践离不开认识,认识离不开实践。为此,人们在对它们的关系加以理解时,表现出这样一种发展趋势:在某一阶段上,人们着重强调它们的“分”(即区别)的这一面;在某一阶段上,人们又重视研究它们“合”(即联系)的这一面。这种情形呈现出交替上升的趋势。按照信息论中的“反馈”原理,认识正是在这种不断反馈中向前推进的。

从中国传统实践观的历史发展来看,对知与行关系问题的探讨留给人们的认识发展轨迹就是一个由分到合、由合到分,……不断进行认识反馈的过程。最初出现在《古文尚书》中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观点就带有将知和行分开认识的特性,到了老子的知行学说,则十分极端地将知与行截然分开。在老子看来,“不出户,知天下”是圣人的境界。他甚至认为,出门越远,接触外界越多,知识越少。而自老子之后,人们开始走向老子“知行分离说”的反面,逐渐地把知与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这种研究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中达到高潮。但是,由于王阳明的做法并没有真正科学地解决知行关系,也就是说,“行”在客观现实中的基础地位是无法借助知的力量来抹杀的。因此,到了孙中山那里,又重提行的重要性,并再次将知行分开理解,提出“知难行易”说。

而从西方近代实践观的发展历史来看,关于知行关系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由分到合、由合到分,……不断反馈的过程。康德重建理性在实践中的地位,就是把中世纪神学将理性与实践分离的做法向其反面发展的结果。认识和实践,在康德那里,重新恢复了联系。但是由康德开拓出来的这项事业,到了黑格尔那里却被推向了极端,黑格尔在绝对理念中将认识和实践合而为一,在绝对理念中实践彻底丧失了

其独立存在的地位，它只是受制于绝对理性的一种存在。面对黑格尔的这种极端观点，马克思、恩格斯采取了辩证的态度加以对待。一方面，通过确立实践与客观事物之间的联系，他们恢复了实践的独立地位，明确指出所谓实践就是“人的感性活动”、“人的客观活动”等。另一方面，通过强调实践对于理论的实现和证明功能，他们指明了实践相对于理论的根本性意义。

第四，关于知行关系的认识是一个逐渐逼近真理的过程。

经过上述分析，人们看到了关于知行关系的认识并非易事而且还出现了在“分”与“合”之间徘徊的情形。但是实际上关于知行关系的认识正是通过经历这样一个过程而向真理逼近的。就中国传统实践观发展情形而言，关于知行关系的认识正因为经历了由“知行分离”说(老子)到“知行合一”说(王阳明)这样一个过程，才会最终出现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这一与传统的“知易行难”截然相对的观点。表面看来，“行之非艰，知之惟艰”不过是传统旧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反对命题，是对知行难易之序的简单颠倒。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它有着丰富的内容，孙中山不仅肯定程朱学派的“能知必能行”，而且还进而提出“不知亦能行”，从而为肯定行先知后奠定了基础。

从西方近代实践观发展史上看，关于知行关系问题的研究的确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一个渐渐逼近真理的过程。当康德将理性与实践相联后，人们开始领会到实践能动性的存在。费希特尽力将实践活动完全置于人的主观活动的范围之内，并努力切断实践活动与外部世界的直接联系；但谢林则认为费希特将实践活动与外部世界的直接联系切断是不科学的作法，他强调实践活动应当是在客观事物中追求“意志的实在性”。谢林企图借助客观精神意义上的“绝对同一”来解决认识的真理性和意志的实在性之间的矛盾，因此，在他那里，实践活动对于客观事物来说最终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存在。主体和客体的“绝对同一”导致了谢林的实践观的反理性主义特征。黑格尔在否定谢林的“绝对同一”的基础上，提出了“绝对精神”这一概念。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是一种“理性的”、“逻辑的”宇宙精神，一切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现象只是“绝对精神”的外部表现。因此，在他看来，实践的意义在于把自己的主观规定性客观化。但是由于客观世界只是“绝对精神”的外部表现，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异在的存在，所以尽管黑格

尔对实践的能动性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解释，但对于主体在实践中的受动性他却不可能进行合理的说明。而在黑格尔已取得的成果之上，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把实践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从而将实践的受动性和能动性这两大特性一并展现在人们面前，使得他们最终完成了实践观发展史上的革命。当然，正因为人类对知行关系的认识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因此，在今后的认识中，即使再出现一些反复，也只不过是认识发展规律的一种反映，而且只是通向真理过程中的反复。

第五，实践与价值的关系问题是关于实践问题研究中的本质性问题。

通过对中西方实践观发展史的考察，人们不难发现，关于实践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围绕知行关系问题展开的，但这是否就表明知行关系问题是实践问题研究中的本质性问题呢？客观地说，知行关系问题是实践问题研究中的基本问题，但不是本质性问题。的确，知行关系问题解决得好与坏，对实践问题的研究状况有着直接的影响。例如，当黑格尔提出实践绝对受制于绝对精神之后，他在社会历史领域中所持的观点只能是唯心主义，致使他仍积极主张绝对精神决定社会存在。但如果简单地将该问题视为本质性的问题，却是有失客观的。

众所周知，关于实践，在中国传统哲学发展史上，人们一直是围绕着道德践履来加以理解的。而在西方近代实践观的发展史上也经历了由康德主张实践的本质意义在于道德实践，到马克思将生产劳动纳入到实践领域、科学地理解了实践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无论是中国传统实践观还是西方近代实践观都是以道德实践作为自己理解实践问题的逻辑起点，这一点绝非偶然，它反映了实践问题与道德问题之间存在着不可忽略的内在联系。从实践问题的逻辑发展进程来看，道德实践是最初的一个逻辑环节，它是一种最为直观的实践形式。在这个逻辑环节中，实践与价值几乎是完全同一的。我们知道，所谓价值指的是人的“内在尺度”，所谓价值判断则是指人们以自身的内在尺度为依据，通过使用“应当”或“不应当”、“应该”或“不应该”、“要”或“不要”这样的词语来描述行为。从根本上说，道德实践实际上就是完全以价值为基础的一种实践形式，它在十分完整的意义上对人们“应该如何做”作出了明确规定。因此，从道德实践中，人们可以深刻地理解到实践与价值之间的内在联系。按照康德的观点，人的道德活动乃是一种超越自然法则的限制、排除一切感性冲动、自然

本能和欲望爱好等经验因素、单纯出于“应该”的自由活动^③。在这里,他明确强调了道德实践与价值之间的内在联系。

从本质上说,实践与价值的关系问题是贯穿整个实践问题的主线,对于实践问题的科学阐释就是对实践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加以深刻思索的结晶。列宁说道:“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④列宁的这段话充分地反映出,人类实践的重要意义就在于通过实践活动实现人类自己的内在价值尺度。所谓知行关系问题,主要所强调的其实就是人如何用自己的内在价值尺度去指导实践,改变客观世界。因此,实践与价值的关系问题是关于实践问题研究中的本质性问题。它不仅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而且应当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实践问题的新的生长点,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实践观新的发展前景。

总而言之,通过对中国传统实践观和西方近代实践观的辩证思考,我们对中西方实践观的区别与联系以及实践观发展中的规律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黑格尔曾说:“我们在现世界所具有的自觉的理性,

并不是一下子得来的,也不只是从现在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而是本质上原来就具有的一种遗产,确切点说,乃是一种工作的成果,——人类所有过去各时代工作的成果。”^⑤因此,考察实践观的发展规律,对于深入研究关于实践的学说,建立现代实践观,必将是大有帮助的。我们今天的研究是人类各个时代对实践问题加以探讨的“工作的成果”,在实践观领域里的过去的东西作为“遗产”已构成了我们今天的实践观中的共同性和永久性的成分,它们深深地影响着现代实践观发展的精神内涵。

注 释:

- ① 马克思·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 ② 参见张伟志《康德的道德世界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页。
- ③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9页。
- ④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8页。

(责任编辑 严 真)

Thinking on the Rules in the Study of Practice

Ouyang Ying

(Social Science Academy of China, Beijing 100732, China)

Author: Ouyang Ying (1964-), female, Doctor, Assistant researcher, Research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Social Science Academy of China, majoring in Mao Zedong's thoughts of Philosophy.

Abstract: There are some distinctions and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views of practice of the old China and the recent West. Through comparing, we may learn some rules: 1. it is difficult to realize the unity of understanding about knowledge and practice; 2.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content of practice is from “should be” to “to be”; 3. learning about the links between knowledge and practice is the course of feedback; 4. learning about the links between knowledge and practice is to the truth gradually; 5. the link between practice and value is the key problem in the study of practice.

Key words: Chinese traditional view of practice; recent view of practice in the west; Law in studying the problem of practice